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18
1994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

目 录

新 文 献

新发表的马克思文献

革命的西班牙——九…………… (1)

理论 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发展了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

社会观……………〔德〕雷·梅尔克尔 (12)

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第Ⅶ—Ⅹ笔记本…………… (67)

关于马克思《伦敦笔记》第Ⅺ—ⅩⅣ

笔记本…………… (103)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殖民地

问题的研究……………张钟朴 (144)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反对

普鲁士德国参与镇压巴黎公

社的斗争中站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一边……………〔德〕埃·库恩德尔 (201)

关于马克思1835—1843年的著作和书信…………… (224)

关于恩格斯1838—1842年的著作和书信…………… (234)

学术讨论

- 关于《通告信》中“苏黎世三人团”的
译法…………… 王宏道 (247)

书讯与书评

-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外文新书目 (十一) …… 图采 (252)

卡尔·马克思

革命的西班牙——九

德·沙多勃利昂先生在他的《维罗那会议》一书中指责1820—1823年的西班牙革命只不过是人们穿着卡斯蒂利亚服装在马德里舞台上拙劣地模仿法国的第一次革命而已。他忘记了，从封建社会状态中产生的、正在向着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不同国家人民的斗争，除了带有因种族、民族、语言、各时代的风俗习惯和装束而形成特殊色彩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不同的地方。他的责难使我们想起了那个总是觉得所有迷人的姑娘都是模仿她自己妙龄时代风姿的愚蠢的老太婆。

拥护和反对1812年宪法的书多如牛毛。这部宪法在1820年的宣布，引起了旧社会的成见和利益与新社会的要求和渴望之间达3年之久的斗争。现代国家在它们的复兴时代最初创制的一切宪章的特点就是不能实行，1812年宪法给自己深深地打上了同样的印记。在产生这些宪章的革命时代，它们不能实行，这并不是因为这段或那段条文，而只是因为它们的立宪性质。在立宪时代，它们也不适宜，因为其中充满了大量有关社会复兴的曙光的虚妄之谈。例如，1791年的法兰西宪法在当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反动的，然而，在1830年它却被认为犯了雅各宾主义的罪。为什么这样？这是因为，在1791年，王权和它所代表的旧社会的统治势力，还没有经历过使它们能够同新社会的因素结合起来并在这些因素当中获得地位的变革。当时需要的是挫败旧社会抵抗的革命行动，而不是一部

批准不可能实现的同旧社会妥协的宪法。相反地，在1830年，当君主立宪制已成为可能时，不言而喻，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解放。这时，1791年宪法就像是带煽动性的与时代相悖的东西。这一说法对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同样适用，但是毕竟应该把1791年的法国和1820年的西班牙区别开来；1791年的宪法只是在两年的革命进军之中佯称要停一下，而1812年的宪法则要完全取代革命。头一天还在实行东方专制制度的西班牙，一天后却要实行以君主为首的民主制度。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只有在西班牙的历史中才会出现。当斐迪南七世在1823年和1814年恢复专制权力时，他大笔一挥便把无统治者的革命时期的一切成果勾销了。革命者方面也以同样的方式行动。1854年，西班牙人民又开始拥护被他们在1843年赶下台的埃斯帕特罗。1814年，革命因斐迪南拒绝宣誓效忠加迪斯宪法而终止。1820年，革命又以强迫他宣誓效忠同一部宪法而开始。他重新召开了已于两年前解散了的那个议会，还任命了他在1814年放逐或囚禁的那些人当大臣。西班牙的一切党派都同样顽固地从他们本国的史书中撕掉那些不是由他们自己撰写的篇章。由此就出现了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些骇人听闻的强求，这一连串无止境的、不间断的争斗。由此也就出现了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或许会遭到挫折，但绝不会沦为灰心丧气，消沉气馁。

第一届立宪内阁可以认为唐·奥古斯丁·阿尔奎列斯是它的领导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由1814年的殉道者组成的。总的说来，殉道者是非常危险的政治人物。他们好像是因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失败而萎靡不振；由于妄自夸大过去的功绩而得意洋洋；由于勇气受挫而喜欢渲染自己的能

力；他们往往宣称，随着他们的当政，革命时代就结束了；从他们的复出这一事实可以想象出革命的正统主义者或正统的革命者的性格；他们对于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对手的那些新人极端嫉妒；他们常常在对反革命的畏惧和对无政府状态的忧虑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来摇去；他们迫于形势而同反革命妥协，为的是不使自己被无政府状态冲走，或者不致看到他们一向称之为进步的真正界限的东西被废除。阿尔奎列斯内阁就是如此。从它成立到议会举行会议的这4个月期间，国家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被暂时停止了。各省和首都成立了洪达，并且出现了由秘密团体支持的公共俱乐部，第一次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杂志，雪片般飞来的请愿书，爱国歌曲，建立了一些立宪纪念碑，举行了一个国家重新获得自由时必定会举行的兴高采烈的示威游行，但是并没有发生报复行为，没有犯罪事件，而且还表现出宽宏大量——这对惯于恣意忘为的南方人来说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议会终于在1820年7月9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议员们选举塞维利亚的大主教唐·霍赛·埃斯皮加为议长。斐迪南七世就像在地方自治机关面前做过的那样，在他们面前把手搁在《福音》上宣誓遵守加迪斯宪法。他说：“一旦人民不应遭受的过多苦难促使人民明确表达出长期受压抑的愿望，我就立即遵循他们所指明的方针，并宣誓效忠1812年议会通过的宪法。从现在起，国王和人民都拥有了各自的合法权利。我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斐迪南七世是一个暴虐的懦夫，一只具有兔子心肠的老虎，一个对权力贪得无厌又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一个觊觎专制权力以便能够把它抛弃给自己的侍从的亲王，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值得骄傲，那就是他的

达到登峰造极的伪善本领。他在获胜的敌人面前拼命羞辱自己，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因为他已决定要在适当时机用更令人震惊的背信弃义行为来洗雪耻辱。当他是拿破仑的阶下囚时，他低声下气地对拿破仑给他提供的庇护表示感激，并乞求波拿巴家族把一个公主嫁给他。当波拿巴和他商议恢复他的西班牙王位时，他在一封阿谀奉承的信中郑重声明，如果他对他的恩人皇帝陛下忘恩负义的话，他将是最卑鄙的人，并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一封密信给马德里的摄政政府，告诉他们，他一旦获得自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法兰西皇帝。当他在1820年7月9日重新宣誓效忠宪法，声称他的“决定是自由的和自愿的”时，西班牙伯爵和庞斯先生已经在巴黎以他的名义同马松阁派，也就是同阿图瓦伯爵（后来是查理十世）及其党羽商谈取消这一部宪法的手段了。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些时刻，例如在颁布1823年9月30日法令时，他以最庄严的方式许下虚假的诺言，仅仅是想要享受一下违反这些诺言的乐趣，而别无其他的目的。他把反对革命这一重要任务完全交给旧制度的拥护者，而他自己则用各种办法来给他们撑腰打气，但在内心都有所保留，即如果他们时运不济的话，就否认同他们有关系，如果他们被击败的话，就不动声色地把他们交给他们的敌人去发泄愤怒。对于他人的痛苦，再没有哪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斯多葛主义的态度漠然处之。由于他所处的官方地位，他只限于用戏谑宪法的办法来表示他对宪法的憎恶。比如，有一天晚上，他给内阁首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他已任命孔达多将军为陆军大臣。大臣们在军人名册上找不到孔达多的名字，当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孔达多竟然是一个已达84岁高龄、早已

根本不能服役的前骑兵中队长时，他们大吃一惊。被如此傲慢无礼地愚弄了的大臣们提交了辞职书。斐迪南成功地调整了这一冲突后，提议让马丁涅斯·罗德里格斯将军代替孔达多，此人也像他的前任一样鲜为人知。再次进行了棘手的调查，结果表明马丁涅斯在巴达霍斯时曾因一个火药桶爆炸头部受了重伤，从那次事故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在消极的厚颜无耻和积极的胆怯畏缩方面可以说是行家里手的斐迪南七世，从不惧怕挑起一场灾难，因为他已决定要对危险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手段。

议会中的多数派是由加迪斯议会议员即宪法的起草者们的和他们的拥护者组成的，而少数派则是由那些曾经密谋恢复宪法的人组成的。多数派把宪法的宣布看作是革命的终结，而少数派则把这看作是革命的开始，前者控制着政权，而后者仍在努力夺取政权；1812年的自由派与1820年的自由派即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1812年的自由派在议会中占优势，那么1820年的自由派则在俱乐部、报刊杂志和大街上占上风。如果说前者支配着行政机构，那么后者则依靠岛上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实力由于一些没有参加军事叛乱的团的加入而得以增强，他们仍集结在安达卢西亚，由里埃哥统率，基罗加已被作为议员派往议会。为了摧毁激进派的据点，陆军大臣德·拉斯·阿马利亚侯爵解散了岛上的军队。在此之前，里埃哥已被调离了他的部队，借口是他已被任命为加利西亚的总督。岛上这支在西班牙配得上军队这个名称的唯一部队刚被解散，在卡斯梯里亚和西班牙北部就出现了第一批“信军”匪帮。

里埃哥应他的拥护者们的秘密召唤，于8月31日突然出现在马德里，他变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他们用狂热的欢呼

和洋溢的热情迎接他，而内阁则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场大灾难。他们决定把他流放到奥维多去——岛上的其他几名军官也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了。虽然里埃哥对这种专横的放逐行为没有反抗，但是大臣们由于害怕他在夜间离开马德里时可能发生暴动，因此下令卫戍部队全副武装占领重要地区，并在马德里的各条大街上到处架起了大炮。而第二天，阿尔奎列斯在议会上提议应该采取措施来对付受到托雷诺和马丁涅斯、德拉·罗萨热情支持的民众集会。从这一天（1820年9月7日）起，两个自由派公开决裂了，革命运动出现了倒退。1848年革命后最初几个星期在欧洲出现过的那种对秩序的狂热、对无休止的鼓动的抱怨、对民众情绪激昂的每一迹象的愤懑焦虑——这种种情绪现在立刻攫住了半岛上的自由派贵族和中间阶级上层。

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820年11月9日结束。和自己的忏悔神甫维克托·赛斯一起退到埃斯库里亚尔去的斐迪南七世认为这是伸出他的触角的适当时机。他不顾宪法的规定，便以一道国王的敕令，不经责任大臣副署签名，任命卡瓦哈尔将军接替比戈德特将军为新卡斯梯里的总督和马德里的司令，然而比戈德特将军拒绝把他的职位交给卡瓦哈尔。相信自己吃了败仗的内阁现在求助于当初正是遭到它迫害的那个政党。它起用了俱乐部的领袖人物并毕恭毕敬地接受了马德里地方自治机关坚持要国王回到马德里的措辞激烈的请愿书。在议会闭幕期间代行其职能的常设委员会也草拟了一份类似的请愿书。卫戍部队和民军进入戒备状态，俱乐部的会议变成了长期会议；老百姓对国王发出了带侮辱性的威胁；日报公开鼓吹造反，看来，群众马上就要前往埃斯库里亚尔接回国王。斐迪南七世屈服于这场风暴的压力，撤消了他的令人

厌恶的法令，免去了他的反自由派忏悔神甫的职务，于1820年11月21日携全家回到了马德里。他回来时的情景就像路易十六和他一家于1789年10月6日被迫从凡尔赛回到巴黎时的情景一样。

内阁如果不撤消后来公开声称自己是君主专制制度热诚拥护者的德·拉斯·阿马利拉斯侯爵的陆军大臣职务，并把岛上的军官提升到各个指挥岗位上去作为给1820年的自由派的公正补偿的话，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里埃哥被任命为阿腊贡的总督，米纳被任命为加利西亚的总督，而贝拉斯科则被任命为埃斯特勒马杜腊的总督。殉道者内阁由于在对反动势力的畏惧和对无政府状态的担忧这种两情绪之间摇摆不定，竟弄到在所有党派面前都威信扫地了。至于王室，用一位彻头彻尾的正统主义者的话来说，它的地位“仍旧不稳，这是由于它已无法控制的保皇党人的轻率的狂热所造成的”。

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1821年3月1日），国王完全用一个政治演说家的语调和手势来进行表演，他不满足于仅仅宣读内阁为他起草的演说，他对他们起草的讲稿加以修改，使之具有革命的意义，并且对一些最关键的段落，如有关叙述奥地利入侵那不勒斯的段落，抹上更耀眼的色彩，从而使大臣们感到迷惑不解。有一阵大臣们异想开天地认为他们已改变了斐迪南七世的信念，但是不久，他们便醒悟了。斐迪南在结束演说时对使他遭受威胁和侮辱的大臣们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他认为，如果政府拿出宪法所要求的和议会所希望的那种毅力和魄力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国王的立宪演说只不过是解散内阁，并任命一个新内阁的前兆。使全国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新内阁中没有一个人倾

向于新制度，没有一个人在前届政府中不曾扮演专制暴政的代理人的角色。

新内阁首脑费利乌先生从前是利马一个民军团的中尉和代表秘鲁出席1812年议会的议员，甚至在加迪斯议会时代他就已经享有了唯利是图的狡猾的阴谋家的名声。外交大臣巴尔达希从前是一个与专制内阁首脑有关系的外交官，而过去任卡斯梯里市政参议员的佩莱格林夸耀说，他曾完全献身于神圣同盟的事业。这个甚至不能奢望在议会中有任何影响的内阁自称，它的目标是“恢复秩序和制止无政府状态。”于是，激进派再次被调离指挥岗位，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奴才派，重要的职位都被委托给那些以仇恨现行制度而著称的人。在半岛上曾经出现的一切保皇党的阴谋都被罩上了一层帷幕，那些几乎全被人投入监狱的阴谋策划者都被政府释放了。卡塔赫纳伯爵莫里略将军刚刚从泰拉非尔玛回来。他在那里已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因为他残暴、独断专行、缺乏正直，他还狂热地进行了一场6年之久的残杀同胞的战争。他回国时在巴黎逗留了几天，在那里他亲自参与了马松阁的阴谋。巴黎的极端派报纸把他描绘成一个要恢复国王旧日的权利并破坏议会权力的人。当他到达马德里的时候，内阁对他毕恭毕敬、推崇备至，并任命他为马德里市和马德里省的司令。奴才派显然正期待这项任命以进行政变。一个有坚强毅力和强烈的正统主义观点的将军唐·霍赛·马丁涅斯·圣马丁，以首都总督的身分同莫里略联合起来了。当马德里似乎笼罩在莫里略制造的恐怖之中时，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成了激烈争夺的场所。加迪斯、塞维利亚和巴达霍斯爆发了公开起义，拒绝承认政府官员，宣称除非解散内阁，否则他们将拒绝服从国王的任何命令。国王在1821年11月25日发布

的一份文告中号召议会制止这些骚乱。议会在一份由唐·霍赛·玛里亚·卡斯特拉瓦起草的复文中谴责了加迪斯和塞维利亚发生的事情，但坚持要求解散已经失去全国信任和“继续执政的道义力量”的内阁。尽管议会已投了不信任票，但是直到1822年3月1日新议会召开前48小时，斐迪南都认为不必任命一个新内阁。

新议会进行选举的时候，由于政府实行反革命方针，流传着奥地利准备武装干涉以阻止实施在那不勒斯宣布的西班牙宪法的消息以及由于“信军”匪帮在半岛各地掠夺征讨，人民群众的愤怒正在不断增长。1820年的自由派，此时已称为激进派，当然获得了压倒多数。一个温和派评论说，“新立法机构中的压倒多数一无所有，因而什么也没有失去。”他们几乎全部来自中间阶级中的平民阶层和军队。他们和他们的前任之间的区别仅仅从以下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那就是后者推举塞维利亚的大主教为他们的议长，而前者则让拉斯卡韦萨斯的英雄——唐·拉斐尔·德·里埃哥坐上了议长席。

由1820年议会的前议员组成的新内阁，是马丁涅斯·德·拉·罗萨建立的，他接管了外交部。马丁涅斯·德·拉·罗萨此后在无辜的伊萨伯拉的统治下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从前是短命的1814年马德里议会的议员；在反动时期曾遭到迫害，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温和派，西班牙最优秀的诗人和散文家之一，他历来都是基佐的空论学派的忠实信徒，这些先生们的温和就在于他们具有一种固定的概念，即向广大民众的让步绝不能过分温和。他们因建立了和旧制度的各种各样弊端与传统掺合在一起的自由派贵族政治和资产阶级最高统治而得意洋洋。受到法国驻马德里的连续两任大使——拉伐

尔·德·蒙莫朗西亲王和拉加尔德伯爵——极为殷勤的款待、讨好和阿谀奉承的马丁涅斯·德·拉·罗萨打算对1812年宪法进行修改，成立贵族院，授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规定下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和对报刊进行限制。从1834年到1836年，这个不可救药的空论家有幸目睹了他在1822年搞出的早产宪法的实施和废除。法国外交家们告诉他，土伊勒里宫会赞成建立与法国当时存在的制度相似的制度，而他自认为国王不会不喜欢一部曾使路易十八能为所欲为的宪章。然而，国王却用花言巧语欺骗了这位自命不凡的温和派，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他曾打算把马丁涅斯直接从宫廷送上断头台。

按照权奸和内阁之间商定的计划，对一切阴谋活动都假装看不见，对混乱状态也任其到处蔓延，这样日后就可以在法国的帮助下推行秩序，并为国家制定一部能使倡导者们享有永久的权力和势力并把特权阶级争取到新制度一边来的温和的宪章。因而，与自由派的秘密协会针锋相对，成立了一个以温和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秘密协会，即阿尼略协会，协会会员的行动要和内阁保持一致。在皇家卫队中分发了大量钱财，但是，当城市治安警察向内阁告发这一情况时，却受到了一顿奚落，因为内阁把这一报告看作是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征兆。驻扎在安卢西亚的皇家胸甲骑兵团已经完全堕落了。在阿尼略协会成员被派去担任政治长官的各省，令人惊惶不安的报道四处流传。与此同时，各法庭都接到了秘密指令，要它们对可能归它们审理的一切密谋案件予以宽大处理。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在马德里掀起一场暴乱，以便和瓦伦西亚的暴乱相呼应。1814年的变节者、当时被囚禁在该城的埃利奥将军打算充当西班牙东部反革命的首领。只有一个团的瓦伦西亚卫戍部队非常拥护埃利奥，因而对立宪制度怀

有敌意。在议会会议上，贝尔特兰·德·利斯议员恳请大臣们把这支部队从瓦伦西亚撤回，当大臣们拒绝这一请求时，他们对他们提出了弹劾。举行暴乱的日期约定在（1822年）5月的最后一天即圣费迪南节，宫廷当时在阿兰惠斯。按照约定的信号，卫兵们冲上街头，他们在阿兰惠斯的暴徒的支持下，聚集在王宫前，大声高喊“我们的专制君主万岁！打倒宪法！”然而，这场骚乱立即被萨亚斯将军平息了。同时暴发的瓦伦西亚团的叛乱，在经过一场民军和士兵之间的流血战斗之后也没有成功。阿兰惠斯和瓦伦西亚的失败只起到了激怒自由派的作用。各地的党派都准备进行自卫。到处都动荡不安，只有大臣们仍在宣告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混乱中袖手旁观。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3卷第458—465页）

（李壮志译 陈惠生校）

译 后 记

马克思于1854年8月至12月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本篇是其中的第9篇。马克思当时密切注视着欧洲革命运动的一切征兆，非常注意1854年夏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1854年8月25日至11月14日写的前7篇作为9篇发表，本篇于12月9日随邮船到达纽约。但是编辑部没有发表它。

马克思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了 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社会观^①

〔德〕雷纳特·梅尔克尔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制定（在该著作的第一章里有对这种历史观的比较完整的初步阐述），关于无剥削社会及其建立的观念也获得了具有新质的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里这样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直接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¹

^①本文是作者于1970年7月2日在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所进行答辩的博士论文《论科学共产主义确立时期(1842—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中的一章，文字略有改动，注释有删节。一译者注

然而，这里用令人信服的逻辑得出的是与先前一切此类概念截然不同的无剥削社会的观点：

恩格斯写道：“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思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²。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非常重视突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前提。他们写道：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³

这样的共产主义定义具有根本意义并确定了新的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概括了人类社会全部发展史的经验。同时他们认识到，这个发展是一系列彼此相继的社会形态，它们总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标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仍然以交往关系这个概念来概括生产关系。每当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交往关系的界限时，就出现冲突，最后当时的交往形式被取代，即以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制度是以往社会发展的结果，它从其自身产生了无剥削社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种方式证实了建立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内在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已提上议事日程，从而把无剥削社会的理论从空想变成科学。这个无法估量的理论功绩——例如，从恩格斯的话中可以看出——同时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因为无产阶级现在第一次掌握了**有科学根据**的目的观念。

从概括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经验的角度论证的，例如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是全新的理论，因此从对其论证的深度来说也是一种新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研究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突破也表现在他们用最明晰的语言阐述了他们的新结论。如果说他们在过去还常常用一些来自以往哲学惯用语的名称和范畴来表达他们的新结论，那么现在他们则创造了自己的概念系列，而且采用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术语，比如交往关系，他们把交往关系理解为生产关系。

这些新结论仍然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往的著作所准备的。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主要是马克思作出”的，⁴ 他在另一处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来证明他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⁵。然而，与以往任何著作不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结果，是紧张研究的结果，同时是为澄清复杂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搏斗的结果，不过也是他们毫不掩饰地乐于以犀利的笔锋完全彻底地打垮对手而得到的结果。恩格斯在1883年把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章称为“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⁶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11月开始撰写这部内容丰富的著作⁷，绝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意愿。虽然如马克思后来所写的那样，是要“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并且“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⁸，但是，这项工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说的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这是确定这部著作的性质及其撰写时间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前提及要求。